

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三

中国特色社会学 理论的拓展

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前沿问题

郑杭生 著

C91
40

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拓展

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的前沿问题

郑杭生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SBE 26/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前沿问题/郑杭生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

ISBN 7-300-06290-3

I. 中…

II. 郑…

III. 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国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9733 号

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三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

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前沿问题

郑杭生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5×1300 毫米 1/16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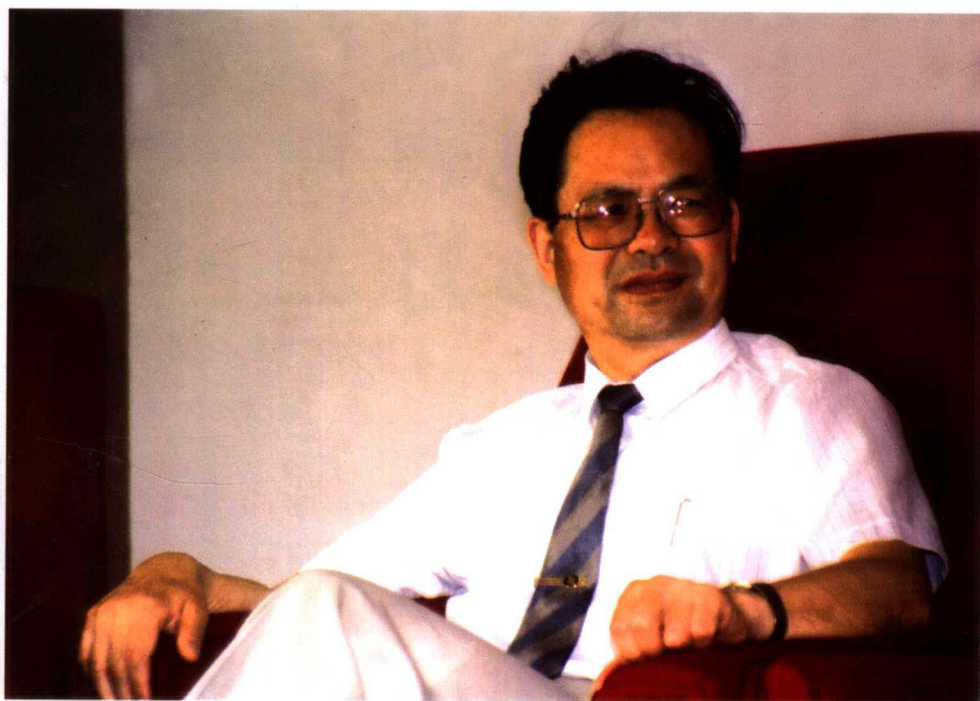
印 张 49.25 插页 7

印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818 000

定 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郑杭生教授



中國特色社會學的國際品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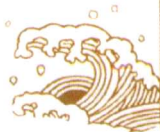
國際眼光
全球視野
世界觀點
五洲胸懷

鄭杭生
氣和文軒
二〇一三年九月

中國特色社會學的本土根基

神州氣派
本土風格
中國特質
華夏品位

鄭杭生
氣和文軒
二〇一三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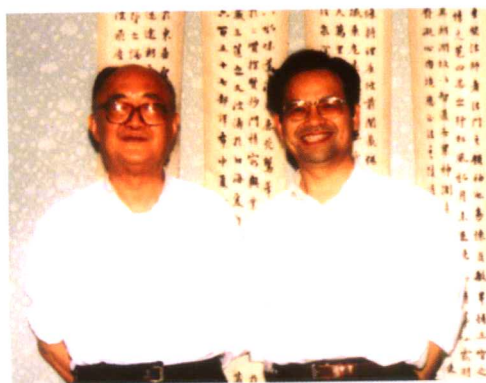
1984年与大学老师肖前、李秀林（左）合影



1985年与陈翰笙先生在一起



1985年主持李景汉先生从教50周年暨90寿辰庆祝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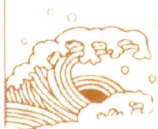
1986年5月摄于胡绳先生家中



1986年4月访问吴泽霖先生时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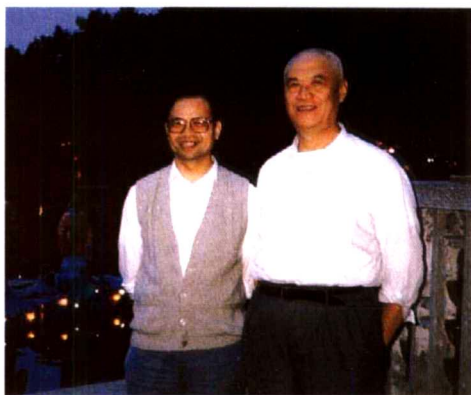
1986年与何肇发先生在京西宾馆参加“七五”社科基金评审时合影留念



1989年在日本京都与立命馆大学社会学部饭田哲也教授合影，两人同年同月同日生



1988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法社会学国际研讨会期间与社会学教授费德里科·D·阿戈蒂诺 (Federico D'Agostino) 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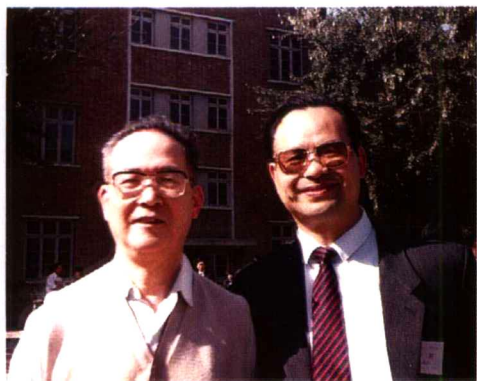
1990年与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徐经泽教授在济南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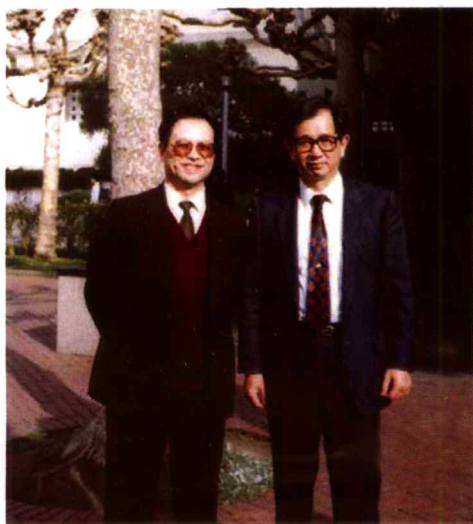
1990年祝贺费孝通先生八十大寿时合影 (站立者从左至右依次为潘乃谷、高德、郑杭生、宋家鼎)



1990年与一起参加国际会议的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在纽约联合国大楼前合影



1991年与王康教授合影



1991年与李远哲教授在美国
加州伯克利大学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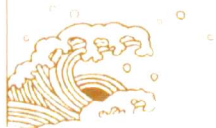


1991年与中国社会学会会长袁方在
新春茶话会上



199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社会学
教授刘绍佳

1993年在承德与参加中英通使200周年
的法国著名学者佩雷菲特合影



1993年中央统战部刘延东同志访问
郑杭生时合影（右为夫人宫延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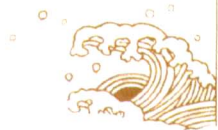
199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与金耀基（左二）、
李沛良、刘绍佳（右一）诸教授在一起



1994年会见纽约大学教授熊玠



1994年与沃尔德教授在哈佛大学



1994年与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著名社会人类学家、中国民族学会会长宋蜀华教授在评议组开会期间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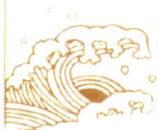
1997年与林耀华先生在昆明合影



1999年与大学老师苗力田教授合影



2000年与龚育之教授在海德堡合影



2001年1月看望费孝通先生



2001年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
张德胜教授合影



2002年与宋林飞教授在社会分化研讨会上



2002年春节看望雷洁琼先生



2002年台湾东海大学学术会议期间与
李强教授、孙立平教授（右）合影



2002年与金耀基教授在南京合影

自序

1998年3月底，在我应聘去日本立命馆大学担任一年客员教授前一个星期，接到宋林飞教授的通知，说按照他与宁夏人民出版社达成的关于出版“当代中国社会学家代表作丛书”的协议，要求我编一本自己的文集。我认为这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是一件好事，因此积极响应，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匆忙编成一本文集，并写了自序。当时符合入选条件的中国社会学家共有12位。遗憾的是，由于宁夏人民出版社领导的人事变更，这套丛书的出版被无限期搁置起来。

自那时以来，六年过去了。我个人的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如何编书的想法也有所不同了。那个文集已经不再适用了。

第一，有许多新内容要增加，不少以前的内容要补充。

我自1997年年中由于年龄原因（超过60岁），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行政岗位上退下来，由一个“双肩挑”干部变成了“单肩挑”教师，有了更多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来从事学术研究和其他学术活动。同时1998年编成的文集由于过于匆忙，漏掉了不少内容。所以，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有许多要增加和补充的。

从内容上说，从1998年起，在以前提出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的基础上，我又相继提出了有新视角的学科本土论（社会学中国化理论）和社会互构论（社会学元理论），也就是从以前的“两论”变成了现在的“四论”。令人高兴的是，上述“四论”已经对学界、对日常生活、对制定社会政策时所持的主导观念，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更令人高兴的是，我在19年前（1985年）正式提出的社会学定义中的关键词之一“社会协调发展”（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已经从学术语言变为大众语言，又从大众语言变为

政策语言。

从数量上说,1999年从日本回来后,我自己独立写了一些文章,也和我的学生及同事合作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数是对“四论”的进一步发挥和“四论”在不同方面的应用,再加上上次文集漏掉的一些重要文章,篇幅有了很大增加。因此,本次的“学术历程”由上次“学术文集”的一卷本,变成了现在的三卷本,每卷的分量也都增加了。

我真有点暗自庆幸,1998年编成的文集没有出版,否则会有不少遗憾。

第二,对如何编写有了新的想法,对如何使用也有了新的考虑。

这套书之所以取名为“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而不叫《郑杭生社会学文集》,主要有研究和教学两方面的原因。

从研究的角度看,我认为,较为系统地表达多年来我和以我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对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及其应用和扩展的过程,并且进行认真反思,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这在世界社会学进入反思和重建的时期,尤其如此。

我们的探索,从理论上说,经历了从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的过程。总的探索路线、研究框架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这就是说,一方面,尽可能在理念上、视野上保持与世界社会学的发展趋势的同步。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所出的东西已经被国际国内的社会学发展远远抛在后面,那么出版“学术历程”,就没有多大的持久的实际学术意义,至多只有暂时的象征的历史纪念意义。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从自己国家的实际状况出发,努力汲取我国源远流长的学术思想传统中的精华,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所出的东西只是人云亦云、照抄照搬,那也没有多大的意思。总之,在我看来,中国特色社会学必须既有本土根基,又有国际视野。

同时,上述“四论”的进程,大体与我在“七五”、“八五”、“九五”、“十五”期间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课题或重大课题、教育部的各类课题相对应,时间段是很清楚的。社会运行论虽然酝酿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英国留学期间,但对其完善和系统化则得益于我承担的“七五”重点课题“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社会转型论虽然酝酿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但对其完善和系统化,要归功于我所承担的“八五”重点课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学研究”,即“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学科本土论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教育部“九五”课题“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立项项目“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而“九五”重大课题“邓小平关于发展的理论和体制转换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的现状”，则极大地推进了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阶层阶级结构的研究；最后，本书所选的社会互构论的文献，分别是“十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阶段成果。这就是说，从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是逻辑和历史一致的过程：一方面它们是内容不断深化扩展的逻辑过程，另一方面又是时间先后相继的历史过程。运用这种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依据这种与较为清楚的时间段相匹配的“四论”来安排文献，能较好地反映我和以我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一个时期抓住一个主要目标不断探索、不断深入、不断拓展的历程，并且也能收到主题突出、线条明晰的效果，便于读者把握。

“社会学学术历程”分三卷，第一卷定名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第二卷定名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第三卷定名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从而把探索跟应用和拓展区分开来了。应当说明的是，这种区分是非常相对的，因为本来探索中就有应用、就有拓展；反之，应用、拓展中也有探索，无法截然分开。这样做只是为了便于分类，从而便于分配文献以及平衡篇幅，并没有其他更多的含义。这三卷的分工大体是，第一卷着重“四论”；第二卷着重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第三卷着重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前沿问题。这从三卷书名的副题中就可以看出。

收入三卷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在报章杂志上发表的，少数是没有发表或没有正式发表的。与著作相比，文章的优点是比较精练，是“红烧中段”，缺点是彼此的关联性、系统性较差。或许，这并不是本书的缺点，而正是它的特点。在每一部分中，内容相近的文章放在一起。我觉得，这样编排可能更便于为读者所理解。

从教学的角度看，多年来，我一直开着一门专业课、一个专题课或讲座课。这就是给本系二年级硕士生开设专业课“理论社会学前沿——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给全校一年级博士生开设专题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思潮”。听众多次要求提供研读的文献和资料。一直因为时间问题，下不了决心。这次编写，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兼顾教学，使它也可作为研究生研读和参考之用的教学参考书。通过本书，学生可以体会教师是如何观察、分析一些社会现象，特别是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的。这是与一般文集不同的用途。同时，为了使包括学生在内的读者在

使用上比较方便,本书在第一卷每个大部分前,加上一个较为系统的导读,用意是把本部分的来龙去脉、主要内容、质疑答疑等有助于读者理解的问题,尽可能加以梳理。在第二卷、第三卷的各大部分前则没有专门的导读,只是在各卷的导言中加以形式不拘、长短不一的简介。

二

在这套书出版之际,我想着重说明我和学术群体的关系。在1998年3月31日为那本未出的文集写的自序中,我首先就强调指出:

这本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文集,无疑主要的是我这些年来进行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成果,但同时也包含着10多年来形成的、以我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的集体成果。这个学术群体的主要成员有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李强、李路路、林克雷、潘绥铭等教授,其他成员还有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他们之中有的也已成为我在社会学系新的同事,如郭星华、刘精明、洪大用、陈劲松等。按照库恩的观点,学术共同体在学科的发展和学派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深信,一种学术观点,只有成为学术共同体的共同的观点时,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自从我先后提出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这两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以来,这个学术群体从许多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探索、深化和应用。我把我的博士点、硕士点方向叫做“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除了在我看来理论必须加以应用之外,也与这样一种学术实践有关。读者可以看到,在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的探索、深化和应用所取得的成果中,学术群体的各个成员都或多或少、这样那样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在我担任10年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期间,如果没有这个学术群体的努力,那么,不管我自己如何注意挤时间,我提出的理论极有可能还是几个主导观念和一个干巴巴的框架,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有一定的丰满度和系统性。这里,我首先要感谢学术群体的各个成员和我的各个合作者。在这本文集中,凡是合作的文章,我都将在每篇文章的脚注中加以说明。同时,每篇文章的脚注还将说明发表文章的报刊、时间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如果是没有发表过的文章,脚注则说明有关的背景。

现在,六年之后,我同样要说,这本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社会学学

术历程”，无疑主要的是我这些年来进行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及思考的成果，但同时也包含着近 20 年来形成的、以我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的集体成果。尽管这个学术群体的成分如今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例如李强教授几年前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到清华大学重建该校社会学系，现在已担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张建明教授已调到北京市教委担任领导工作；上面提到的郭星华、洪大用已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年轻的社会学教授，郭星华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洪大用则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党委书记和副院长；刘精明和陈劲松也早已成为副教授。但最主要的变化还是增加了许多新人，他们就是已经毕业的或还在校的博士生，主要是李迎生、李守信、王万俊、冯仕政、章谦、李霞、周平君、龚长宇、张纯琨、赵文龙、杨敏、张春、何珊君、免平清等，其中，李迎生前两年也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年轻的社会学教授；博士后主要是陆益龙、江立华、翟中东、吴力子、程虎、陆汉文等。还应当补充的是，我还有一些较早毕业的硕士生，如葛延风、任振兴、吕金波、侯保平等，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做了出色的工作，我与他们多年来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学术联系。此外还有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早年的同事，如张小军等。这里，我无法一一说明每个人在上述“四论”中所起的作用，我只能像上次序言所说的那样：读者可以看到，在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特别是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的探索、深化和应用所取得的成果中，学术群体的各个成员都或多或少、这样那样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对此我首先要对他们表示感谢。

谈到学术群体或学术共同体，就不能不涉及学派问题。学派的形成必须有“硬件”和“软件”，两者缺一不可。其中硬件就是学术共同体，软件就是基本上一致的学术观点，尤其是根本观点，也就是一种学术观点特别是其中的根本观点变成学术共同体的共同观点。之所以说是“基本上一致的学术观点”，是因为，即使在一个学术共同体内部，不可能也不应该在所有问题上都毫无分歧。如果毫无分歧，那么这个学术共同体就会是死水一潭，没有什么生命力。所以，一个学术共同体要有生命力，第一是要有基本上一致的学术观点，正如我在 1998 年自序中所说：“我深信，一种学术观点，只有成为学术共同体的共同观点时，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第二是要有活跃的学术气氛。关于学派的内部关系，我曾写过这样一个名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派支撑”的题词：“习思勤精，范式遂现；疑辩勉诚，学派自成。”就是说，一个学派内部，每个成员要不

断学习、思考、勤奋、求精，相互之间则要经常质疑、辩论、互勉、坦诚，这样才能求同存异，真正形成基本一致的共同观点，逐步形成学派。

关于“勤”，我还想顺便提一下。郭星华在2003年评上教授后，要求我为他写一幅题词，于是我写了这样一幅题词与他共勉：“天道酬勤，人德报善，乐观健身，仁义增寿。”其中第一条就是“勤”。多少年来，我聊以自慰的是：从不偷懒。我的学生大多也是以勤著称。

“社会学学术历程”三卷的出版，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形成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运行学派”或“协调发展学派”，有所推动，有所促进，表明它在硬件和软件上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三

出版“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并不是意味着我的社会学探索的结束，而是一种新的开始。编选文章的过程，作为一种回顾和梳理，收益良多，其中最主要的是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强点和弱点，即前进的、深入的地方和做得不够的、表面的甚至有误的地方。我的态度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认为对的一定坚持，原以为对但发觉是不对的或片面的一定修正。我想，一个愿意做随时代前进而前进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根本观点为指导思想的当代中国社会学者，是应当采取这种态度的。我努力遵循的是把科学性和价值性结合起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根本观点，有一个敢于坚持和善于坚持的问题。在当今，敢于坚持不易，善于坚持就更难。善于坚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善于把科学性和价值性结合起来。善于坚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既不附和右，也不附和“左”，在理论上力求不走极端、不搞片面性，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坚持我认为正确的东西。这样做的一个实际后果是：在右的人看来，我好像很“左”；而在“左”的人看来，我又好像很右。这也没有办法，我的态度只能用下面这副对联表示，上联：是“左”是右任人说，下联：不“左”不右行我路；横批：我还是我。这是受到李景汉先生的一点启发：20世纪20年代李先生从美国回来后坚持在下层平民中搞社会调查，当时朋友曾称他是“座上无鸿儒，往来尽白丁”，李先生自己加上一个横批：“我行我素”。

当然，在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结合的问题上，在不附和右、也不附和“左”的问题上，究竟如何，最终要由广大读者来评论。对我来说，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今后还是要尽可能地把科学性与价值性结合起来，